

沫若文集

沫若文集

十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沫若文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734 字数 395,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7}{16}$ 插页 11
1963年6月北京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0001—5000册 (精)0001—1000册
定价(4)2.20元

第十四卷說明

本卷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收研究甲骨文、金文等論著十三篇，这些著作选自《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和《金文从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于1930年，联合书店印行；1947年曾由群益出版社重印；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60年科学出版社出新一版。現根据新一版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編入。

《甲骨文字研究》著于1929年，1931年大东书局影印初版；1952年經作者整理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卷选收四篇。《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著于1930年，初版于1931年，亦由大东书局影印；1954年作者略作修訂，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1961年科学出版社又出新一版；現选收三篇。《金文从考》著于1932年，曾在日本文求堂印行；1952年作者改編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选收六篇及《重印弁言》。选自《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三篇系据科学出版社版本編入外，其余各篇均根据人民出版社版本編入。

本卷全部注釋均系作者原注。



1933年在日本

第十四卷 目录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新版引言	3
自序	6
解題	11
导論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一 社会发展之一般	13
二 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	18
三 周代——铁的出現时期——奴隶制	22
四 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	26
五 中国社会之概覽	30
第一篇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发端	33
第一章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33
第二章 《易傳》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	69
第二篇 《詩》《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	
上之反映	
序說	93
第一章 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	100

第二章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	148
第三篇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序說	卜辭出土之歷史	192
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	201
第二章	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	222
第四篇 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		
一	序說	256
二	周代是青銅器時代	257
三	周代彝銘中的奴隸制度	258
四	周代彝銘中無井田制的痕迹	261
五	周代彝銘中無五服五等之制	267
六	彝銘中殷周的時代性	272
七	餘論	275
附录 追論及補遺		
一	殷虛之發掘	276
二	由《矢彝考釋》論到其他	277
三	附庸土田之另一解	288
四	“矢令簋”考釋	292
五	明保之又一證	301
六	古金中有稱男之二例	303
七	古代用牲之最高紀錄	304
八	殷虛中無鐵的發現	307
九	夏禹的問題	308
十	“旧玉亿有百万”	315
后記		317

甲骨文字研究

釋祖妣	321
釋臣宰	348
釋歲	355
釋支干	366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令彝”“令簋”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469
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	502

附 彙

一、關於新鄭古物補記	511
二、新鄭古器中“蓮鶴方壺”的平反	513
說軒	516
附 彙	
關於軒之演變(郭寶鈞)	530

金文从考

重印弁言	537
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	541
金文所无考	567
《周官》質疑	585
《湯盤》《孔鼎》之揚榷	615
謚法之起源	622
“毛公鼎”之年代	634



新版引言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二十四年了。七年前曾經改排过一次，有所刪改。現在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又重新改排一次。感謝出版社的同志們，費了很大的工夫从事整理，核对引文，校勘全著，訂正了不少文字上的錯誤。

我自己趁这个机会也仔細校閱了一遍，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加添了好些改正。首先是我把篇目改还了原样。初版的篇目，除导論和附录外，是依据研究的先后次第排列的。上次改排时我改編了一次，依据了研究內容的时代先后。这样的改編是不很妥当的，因为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文字的汇集，不依照写作先后排列，便看不出研究路徑的进展。因此，改还原样要比較合理一些。

本书的再度改排是着重在它的历史意义上。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釋历史”的草創时期的东西，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識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貢献了一些新的見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这些本质上的錯誤，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在这一次的改排中，我也尽可能地进行了刪改；有因变动太大，不便刪改的地

方，則加上了補注，以免再度以訛傳訛。

錯誤是人所難免的，要緊的是不要掩飾錯誤，並勇敢地改正錯誤。把自己的錯誤袒露出來，對於讀者可能也有一些好处。因為“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讀者可以從我的錯誤中吸取一些經驗。

研究歷史，和研究任何學問一樣，是不允許輕率從事的。掌握正確的科學的歷史觀點非常必要，這是先決問題。但有了正確的歷史觀點，假使沒有豐富的正確的材料，材料的時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史料苦於不多，而這苦於不多的史料却又苦於包含著很多困難的問題，這就限制了我們所能獲得的應有的成果。對於古代社會的看法，在學者之間很難取得一致，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在此。就拿我自己來說吧，二十多來我自己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好幾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鬥爭。

但從今天所有的材料看來，殷代已進入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這已明確地改正了本書中的一个大錯誤——認殷代為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其次，我在《奴隸制時代》中，已把奴隸制的下限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這也是比較可靠的。這又明確地改正了本書中的另一個大錯誤——只認西周為奴隸社會。

地下發掘出的材料每每是決定問題的關鍵。在目前進行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偉大時期中，被封鎖在地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不斷地開放，古代資料正源源不絕地出土。

研究成果趋于一致的可能性逐渐增长了。我怀抱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史学界的研究工作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期待着我自己的错误会有彻底清算干净的一天。

1953年11月18日

自序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們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否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禪，說是“我們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組成的社会不應該有甚么不同。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需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二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別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沒，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搏焼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

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內障，成了明盲。

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及早療治。

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旁鄉僻壤的巫魂？

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為甚麼還錮蔽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

巫魂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騙錢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成一個拒疔同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凡曾摸着了一点儿边际？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然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維。

王国維一生的学业結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远不及《观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慤公遺书》。

那遺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內容。

这儿正是一個矛盾。

这个矛盾正是使王国維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个原因。

王国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結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

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几千年来旳旧学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样的光輝。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為我們提供了无数的眞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傳、考釋，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應該大书特书的一項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頒布，其內容之丰富，甄別之謹严，成績之浩瀚，方法之革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办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們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業績为其出发点了。

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旧了的衣裳；我們所有的是飞机，再不仰仗別人所依据的城垒。

我們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謂国学的真相。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

不是說研究中国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国人一手包办。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紀載，正还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猾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鱗。外国学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應該自己起来，写滿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国学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开辟了，我們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书的性质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的續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談“国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誠之外，也應該知道还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观念，連“国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

然而現在却是需要我們“談談国故”的时候。

我們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傳統，究竟是否两样！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風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們“鸡鳴不已”的时候。

1929年9月20日夜